

十批判书

(选 编)

目 录

- 孔墨的批判 (1)
- 前期法家的批判 (47)
- 韩非子的批判 (74)
- 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(115)

孔 墨 的 批 判

一、论孔墨的基本立场

到了现在要来论孔子与墨子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他们都是大师，有不少的门徒，尤其孔子，二千年来是被视为了通天教主的，关于他们的事迹和学说，自然不免有不少的美化和傅益。譬如我们读一部《新约》，便只见到耶稣是怎样的神奇，不仅难治的病着手成春，而且还有起死回生的大力。孔与墨虽然没有这样被人神化，而在各自的门户内是充分被人圣化了的。因此，我们如未能探求得他们的基本立场之前，所有关于他们的传说或著作，我们都不好轻率地相信。那么又从什么资料上来探求他们的基本立场呢？很可庆幸的是他们的态度差不多完全相反，我们最好从反对派所传的故事与批评中去看出他们相互间的关系。反对派所传的材料，毫无疑问不会有溢美之辞，即使有诬蔑溢恶的地方，而在显明相互间的关系上是断然正确的。因此我采取了这一条路，从反对派的镜子里去找寻被反对者的真影。

墨子后起，他是反对孔子的。在现存的《墨子》书里面有《非儒篇》，那里面有几段关于孔子的故事，我觉得最有研究的价值。

第一个故事：

齐景公问晏子曰：“孔子为人何如？”

晏子不对。公又复问，不对。

景公曰：“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，俱以为贤人也。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，何也？”

晏子对曰：“婴不肖，不足以知贤人。虽然，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，必务合其君臣之亲，而弭其上下之怨。孔丘之荆，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。君身几灭而白公僂。婴闻贤人得上不虚，得下不危；言听于君必利人，教行于下必利上。是以言明而易知也，行明而易从也，行义可明乎民，谋虑可通乎君臣。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，劳思尽知以行邪，劝下乱上，教臣杀君，非贤人之行也；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，非义之类也；知人不忠，趣之为乱，非仁之类也。逃人而后谋，避人而后言，行义不可明于民，谋虑不可通于君臣；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，是以不对。”

景公曰：“呜乎，赐寡人者众矣，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之与白公同也。”

这个故事，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。楚白公之乱见《左传》哀公十六年。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。七月白公胜发难。齐景公呢，已经死去十二年了，晏婴比景公还要死得早。因此以前的人便都说这是墨子的“诬罔之辞”，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诬罔就算是诬罔吧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因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：墨子是赞成“入人之国，必务合其君臣之亲，而弭其上下之怨”的，孔子呢，则和这相反，“劝下乱上，教臣杀君”。更说质实一点吧，便是墨子是反对乱党，而孔子是有点帮助乱党的嫌疑的。这是极有趣味的一个对照。

第二个故事：

孔丘之齐，见景公。景公悦，欲封之以尼谿，以告晏子。

晏子曰：“不可。夫儒浩居（傲倨）而自顺者也，不可以教下；好乐（音乐）而淫人，不可使亲治；立命而怠事，不可使守职；宗（崇）丧循哀，不可使慈民；机服勉容，不可使导众。孔丘

盛容修饰以蛊世，弦歌鼓舞以聚徒，繁登降之礼以示仪，务趋翔之节以观众，博学不可使议世，劳思不可以补民；累寿不能尽其学，当年不能行其礼，积财不能贍其乐。繁饰邪术以营世君，盛为声乐以淫愚民；其道不可以期世，其学不可以导众。今君封之，以利齐俗，非所以导国先众。”

公曰：“善。”

于是厚其礼，留其封，敬见而不问其道。

孔丘乃患怒于景公与晏子，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，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，归于鲁。有顷闻齐将伐鲁，告子贡曰：“赐乎！举大事于今之时矣。”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，劝之伐吴；以教高、国、鲍、晏，使毋得害田常之乱；劝越伐吴。三年之内齐、吴破国之难，伏尸以亿术数。孔丘之谋也。

这段故事的前半也见《晏子春秋》外篇，但《晏子春秋》一书很明显地是墨子学派的人所假托的。晏子反对孔子的说话完全是墨子的理论，《公孟篇》云：“子墨子谓程子曰：‘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。儒以天为不明，以鬼为不神，天鬼不说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厚葬久丧，重为棺槨，多为衣衾，……此足以丧天下。又弦歌鼓舞，习为声乐，此足以丧天下。又以命为有，……此足以丧天下。’”。这四政和这儿的傲倨自顺，好乐淫人，立命息事，崇丧循哀，是完全一致的。这段故事当然也是在做小说。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后半，同前一个故事表示孔子在帮忙白公胜一样，他又在帮忙田成子。这事恐怕倒近乎事实，另一反对派的庄子后学，在《盗跖篇》里也提到过一些影子：“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。”但在《论语》里面所说的情形便完全不同了。

陈成子弑简公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于哀公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。”

公曰：“告夫三子。”

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告夫三子者？”
之三子告，不可。

孔子曰：“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”

这纯全是忠于主上，而反对乱贼的立场。但我们如要做一个公平的批判人，就宁肯相信《墨子》和《庄子》，而不肯相信一些孔门后学的。因为“三占从二”，我们当从多数，这是一。凡是扶助或同情乱党的人，他的子孙后进是谁也要替他掩盖掩盖的，这是二。

第三个故事：

孔丘为鲁司寇，舍公家而奉季孙。季孙相鲁君而走，季孙与邑人争门关，决植。

这故事颇残缺，“决植”两字上当有夺文，不过意思是可领会的。决假为抉，植是户旁柱，相传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”^①，“决植”大约就是当季孙逃走时，城门掩上了，逃不出，而孔子替他吧把城门挺开了。这位千斤大力士，照墨子看来是心术不正，所以他的弟子们也就跟着他学，到处捣乱。以下是这三个故事的总批评：

孔丘所行，心术所至也。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。子贡、季路辅孔，悞乱乎卫，阳货乱乎齐，佛肸以中牟叛，漆雕刑残，×莫大焉。夫为弟子后生〔子〕其师，必修其言，法其行，力不足，智弗及而后已。今孔丘之行如此，儒士则可以疑矣。

我们真应该感谢墨子或其后学，有他们这样充满敌气的叙述和批评，不仅表明了孔子的真相，而且也坦露了墨子的心

迹。一句话归总：孔子是袒护乱党，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！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以对立的原故，表示得非常明白吗？

乱党是什么？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。陈成子以大量贷出而以小量收回，因而把齐国公室的人民尽量争取去了，这是很有名的故事。季孙氏在鲁也有类似的情形，他礼贤下士，“养孔子之徒，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”（《韩非·外储说左下》）。就拿白公胜来说吧，令尹子西分明称赞他“信而勇，不为不利”。就是反对他的叶公也只说他“好复言而求勇士，殆有私乎？”如此而已。“好复言”应该是说话算数的意思，也就是所谓“信”了。他作乱的一年恰巧是孔子死的一年（鲁哀公十六年），《左传》把那时的情形叙述得相当详细。他在七月发难，把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都杀了，同时也把楚惠王捉着了。石乞劝他杀掉楚王，他不肯；劝他焚府库，他也不肯。结果惠王被人盗去，府库为叶公所利用，他竟一败涂地，“奔山而缢”了。关于焚府库的一节，《吕览·分职篇》有更详细的叙录，今揭之如次：

白公胜得荆国，不能以其府库分人。七日，石乞曰：“患至矣，不能分人，则焚之。毋令人以害我。”白公又不能。九日，叶公入。乃发太府之货与众，出高库之兵以赋民，因攻之。十有九日而白公死。②

据这故事看来，白公这个人实在还太忠厚了一点。石乞倒确是一位好汉。白公死后，他被人擒，人们要他说出白公的死所，当然是准备戮尸，石乞不肯说。不说便要烹他，他也不肯说。结果他被人烹了。他倒确是一位智勇兼备的人。假使他果真是出于孔子的推荐，孔子不要算是很有知人之明的吗？

以下我们再把孔门弟子帮助乱臣贼子的罪状追究一下吧。

第一，“子贡、季路辅孔悝乱乎卫。”

这是鲁哀公十五年的事，在孔子死的前一年。那时候的卫君彻，是蒯聩的儿子。卫灵公不喜欢蒯聩，把他赶出国外去了，死后卫国立了他的孙子彻为卫君，在位都已经十二年了。蒯聩施用阴谋回到国里来，劫持着孔悝，夺取了他儿子的君位。子路在做孔悝的家臣，他因为反对蒯聩，被蒯聩的人把他砍死了。后来把他的尸首也煮成了肉酱。消息传来的时候，据说孔子正在炖肉吃，他连呼“天祝予！天祝予！”（祝者斲也），叫人把炖的肉也倒了。这事，在庄子后学也在加以非难，《盗跖篇》云：“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，身蒞于卫东门之上。”可见墨家和道家是同情蒯聩，而儒家是同情卫彻的。这在我们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，但要说“季路辅孔悝乱乎卫”或“欲杀卫君（指蒯聩言）而事不成”，不仅和当时的情形不甚相符，而且是有点类似于鞭尸戮墓了。

关于子贡的参加，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等书均不曾言及，但除这《非儒篇》之外，《盐铁论》的《殊路篇》也说到子贡。“子路仕卫，孔悝作乱，不能救君出亡，身蒞于卫。子贡、子皋（羔）遁逃，不能死其难。”《盐铁论》或别有所本，大约在当时，子贡在卫也是担任有什么职守的吧。

第二，“阳货乱乎齐。”

阳货一名阳虎，这人在孔门弟子是没有把他当成孔门看待的，而且也把他说得很坏。但其实倒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。《孟子·滕文公篇》引阳虎曰“为富不仁矣，为仁不富矣”，真不失为千古的名言。《盐铁论·广地篇》引此二语作为“杨子曰”，因此有人遂疑阳货即杨朱（宋翔凤《论语说义》中有此说），但在我看来，无宁是杨朱的兄弟杨布。《韩非·说林下》云：“杨朱之弟杨

布，衣素衣而出，天雨，解素衣，衣缁衣而反。其狗不知而吠之。杨布怒，将击之。杨朱曰：子毋击也。子亦犹是。曩者，使汝狗白而往，黑而来，子岂能毋怪哉？”这两弟兄的性情一缓一急，颇有点像宋时的程明道与程伊川。古者布与虎同音，而布作钱币用，与货同义，是则布与货是一字一名，虎是假借字了。以时代说来没有什么龃龉，性格也还相符。

阳虎本作乱于鲁，《左传》定公八年及九年载其事。八年冬十月，阳虎欲去三桓，入于讙阳关以叛。翌年六月伐阳关。阳虎出奔齐。他到齐国，请齐国出兵伐鲁，齐景公都打算答应他了，鲍文子以为不可。鲍文子说他“亲富不亲仁”，又说齐侯富于季孙，齐国大于鲁国，正是阳虎所想“倾覆”的。于是齐侯便听了他的话，把阳虎囚禁了起来。他逃了两次，终究逃到了晋国，投奔赵氏。《左传》在这儿加了一句孔子的批评：“赵氏其世有乱乎！”这意思当然是很不满意于阳虎了。

以上是节取《左传》的叙述，照这情形看来，阳虎无“乱乎齐”的痕迹，因而《孔丛子·诘墨篇》便引作“乱乎鲁”，孙诒让以为“当从《孔丛》作鲁。”然在《韩非·外储说左下》有下列一段关于阳虎去齐定赵的故事。

阳虎去齐走赵。简主问曰：“吾闻子善树人。”

虎曰：“臣居鲁，树三人，皆为令尹。及虎抵罪于鲁，皆搜索于虎也。臣居齐，荐三人，一人得近王，一人为县令，一人为候吏。及臣得罪，近王者不见臣，县令者迎臣执缚，候吏者追臣至境上，不及而上。虎不善树人。”

据此，可见阳虎居齐，为时颇久；而他之去齐是因为“得罪”，则“乱乎齐”似乎也是事实，只这事实的真相是怎样，可不得而知了。唯《韩非·难四篇》亦言齐景公囚阳虎事，则与《左传》

所述相同，或者是传闻异辞的吧。

此外，同一《外储说左下篇》，还有批评阳虎的一节，

阳虎议曰：“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，不肖则饰奸而试（弑）之。”逐于鲁，疑于齐，走而之赵。

赵简主迎而相之。左右曰：“虎善窃人国政，何故相也？”

简主曰：“阳虎务取之，我务守之。”逐执术而御之，阳虎不敢为非，以善事简主，兴主之强，几至于霸也。

这批评可以算得公允。“兴主之强，几至于霸”和《左传》的“赵氏其世有乱乎”完全相反，仲尼的那句评语不是七十子后学的蛇足，便可能是刘歆弄的花样了。特别值得注意的，是这又一可宝贵的二句“阳虎议”——“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，不肖则饰奸而弑之。”这确实是含有些革命的精神在里面的。这种精神不失为初期儒家的本色，例如孟子也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君有过则谏，反复而不听则易位，”和这两句阳虎的主张是很相仿佛的。

第三，“佛肸以中牟叛。”

佛肸是晋国范氏的家臣，他以中牟叛，大约是在鲁哀公五年。《左传》在此年夏言：“赵鞅伐卫，范氏之故也，遂围中牟。”赵氏与范氏敌对，因卫助范氏故伐卫，因中牟叛晋故围中牟也。关于这事，《论语·阳货篇》有纪录：

佛肸召，子欲往。

子路曰：“昔者，由也闻诸夫子曰：‘亲于其身为不善者，君子不入也。佛肸以中牟畔，子之往也如之何？’”

子曰：“然，有是言也。不曰坚乎，磨而不磷？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缁？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”

佛肸要找老师去帮忙，老师也很想借这个机会去行道，“我难

道是个硬壳葫芦儿？只能挂着做摆设，不能吃的吗？”急于想用世的孔老夫子的心境，真是吐露得淋漓尽致。这样袒护乱党的行径，连子路都不大高兴的，公然逃过了儒家后学的掩饰而收在了《论语》里面，实在是值得珍异的事。而且同在《阳货篇》里面还有公山弗扰的一节：

公山弗扰以费畔，召。子欲往。

子路不说（悦）曰：“末之也已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！”

子曰：“夫召我者而岂徒哉？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！”

《左传》作公山不狃，以费畔事系于定公十二年，然在《孔子世家》则系于定公九年阳虎奔齐之后。公山与阳虎同党，阳虎于定公八年“入讙阳关以叛”，公山当亦同时响应，其定公十二年之畔，盖定而复反者也。定公十二年时孔子正为鲁司寇，则召孔子事当在八年。此事虽记于《论语》，而《非儒篇》不及，盖因公山氏非孔门弟子之故。

第四，“漆雕刑残。”

《孔丛子·诘墨篇》引作“漆雕开形残”，形与刑通，漆雕之为漆雕开，殆无疑问。唯因何而“刑残”，事无可考。《韩非·显学篇》儒家八派中有“漆雕氏之儒”，又言“漆雕之议，不色挠，不目逃，行曲则违子臧获，行直则怒于诸侯”，虽同一有姓而无名，亦当是漆雕开。王充《论衡·本性篇》，载漆雕开言“人性有善有恶”，与宓子贱、公孙尼子、世硕诸儒同，可见漆雕开确曾成一学派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儒家有“《漆雕子》十三篇”，班固注云“孔子弟子漆雕启后”，启即是开，因避汉景帝讳而改。后乃衍文。盖启字原作启，与后字形近。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启字，及启刊入正文，而启则误认为后，更转为后也。这一学派既尚勇任气，藐视权威，自然是有遭受“刑残”的充分的可能。且

此事，既与子路乱卫、阳货乱齐、佛肸畔晋等并列，必然也是所谓叛乱事件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

尤可注意的，初期儒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近于任侠的别派而为墨家所反对。近时学者，每以为侠出于墨，或墨即是侠；有此一事也就是强有力的一个反证。任侠之轻死虽有类于墨氏的“赴火蹈刃”，但他们的反抗权威却和墨家的“尚同”根本相反，我们是须得注意的。

又《孟子》书中言：“北宫黜之养勇也，不肤挠，不目逃，思以一毫挫于人，若搯之于市朝。不受于褐宽博，亦不受于万乘之君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。无严诸侯，恶声至，必反之。”这和漆雕氏之议很相近。孟子又说，“北宫黜似子夏”，大约这位北宫黜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，是一位儒家了。

以上，孔子帮助乱党，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，见于《非儒篇》者一共七项。墨家既一一列举出来加以非难，在墨家自己当然是决不会照着这样做的了。这不是很鲜明地表示着了儒、墨两派的基本立场吗？至少在初期，这情形，是无可否认的。所揭举的事实虽然不尽可靠，而《非儒篇》也不必就是墨子所写下来的文字，然把两派的立场实在是画出了极其鲜明的轮廓。以前推崇孔子的人，因为孔子已经成为了“大成至圣”，对于这些材料一概视为诬蔑，全不加以考虑。现今推崇墨子的人，把墨派几乎当成了不可侵犯的图腾，对于这些材料又一概视为痛快，也全不加以考虑。这些态度，我认为都是有所蒙蔽，非把这蒙蔽去掉，我们是得不到正确的认识的。

自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以来，孔子虽然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但在他的生前其实是并不怎么得意的。《庄子·让王篇》说他“再逐于鲁，削迹于卫，伐树于宋，穷于商周，围于陈蔡，杀夫子者无罪，籍夫子者无禁”；《吕览·慎人篇》亦有此说。注云

“籍犹辱也”，足见孔子在当时，至少有一个时期，任何人都可以杀他，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的。这和亡命的暴徒有何区别呢！因此，我们要说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，同情人民解放的，而墨子则和他相反。这在孔门后学或许会喊冤屈，而在墨家后学是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说的。

儒者要喊冤屈，这可能性很大。就是孔子在生当时，他的门徒已经在替他粉饰了。《论语》里面有左列一段故事，值得我们叙录。

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。病间，曰：“久矣哉，由之行诈也！无臣而为有臣，吾谁欺？欺天乎！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，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！且予纵不得大葬，予死于道路乎！”

这个故事不仅表示了孔子的态度，也把过渡时代的当时的时代性，表示得很清楚。臣是奴隶。在奴隶制时，主人死了奴隶大多数是要殉葬的，即使不殉葬总必然有一些特殊的行动。孔子生了病，子路以为会死，故尔把门人来假装成奴隶。这在子路或许是沿守旧制，想替孔子撑撑门面吧，也就和现今都还在烧纸人纸马那样。然而竟惹得孔老夫子那样生气，那样愤慨，痛骂了子路一顿。

我顺便要在这儿解释一下“门人”和“弟子”之类的字眼。这是春秋末年的新名词。那时沿守旧制的，有时也称为“徒”，称为“役”。门人服侍先生，和奴隶的情形差不多，不过是志愿性，而非强制性而已。“有事，弟子服其劳；有酒食，先生馔。”先生出门的时候，弟子要“仆”（即是当车夫），要任徒卫。但究竟不是徒，不是役，年稍长者先生视之如弟，稍幼者视之如子，因而有“弟子”之名。保守的子路，似乎不懂得孔子正以有“二三子”为新时代的光荣，而他偏要使同学们退

回到旧时代的躯壳里去，竟接受了那么一顿臭骂，那是罪有应得的。

但在子路或许还是出于无心，而在孔子死后，有心的粉饰更是层出不穷了。所谓“孔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”，至少在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夸张的。一方面有墨家、道家的攻击，另一方面以前的“窃国者”已经“为诸侯”了，乱党同情者的帽子是不好久戴的。故尔在《论语》里面也就有“陈恒弑其君，请讨之”的完全相反的记事，也更有“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”之类的有道无道的放言。矛盾固然是矛盾，但我们与其相信神道碑上的谀词，无宁相信黑幕小说上的暴露。到了孟子手里粉饰工作更加彻底了，如“孔子于卫主痼疽，于齐主寺人瘠环”，大有不择木而栖的情况，也被斥为“好事者为之”，而另外说出了所主的两位正派人物来。到底那一种说法近乎事实，无从判断，但孟子是惯会宣传的人，他的话要打些折扣才行。举如他所说的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，那也就是一个最适当的例。《春秋》或许真是孔子所作的书吧，但那样简单的备忘录，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当中记下了“弑君三十六，亡国五十二”，与其说足以使“乱臣贼子惧”，无宁是足以使暴君污吏惧的。

二 孔子的思想体系

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，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。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，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。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，也部分地批判改造，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韧

带。廖季平、康有为所倡道的“托古改制”的说法确实是道破了当时的事实。

一个“仁”字最被强调，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。

“仁”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，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，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。这个字不必是孔子所创造，但他特别强调了它是事实。仁的内涵究竟是怎样呢？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说，我们且在《论语》里面去找寻一些可供归纳的资料吧。

一、“樊迟问仁，子曰‘爱人’。”

二、“子贡曰：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，何如？可谓仁乎？’子曰：‘何事于仁？必也圣乎，尧舜其犹病诸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’”

三、“子张问仁于孔子。孔子曰：‘……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。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’”

四、“颜渊问仁。子曰：‘克己复礼为仁。……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’”

五、“司马牛问仁。子曰：‘仁者其言也切。……为之难，言之得无切乎？’”

六、“刚毅木讷近仁。”

七、“巧言令色鲜矣仁。”

八、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，有杀生以成仁。”

九、“仁者先难而后获”

从这些辞句里面可以看出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的行为。简单一句话，就是“仁者爱人”。但古时候所用的

“人”字并没有我们现在所用的这样广泛。“人”是人民大众，“爱人”为仁，也就是“亲亲而仁民”的“仁民”的意思了。“巧言令色”是对付上层的媚态，媚上必傲下，故他说“鲜矣仁”。“巧言令色”之反即为“刚毅木讷”，对于上层能如此，对于下层也不过如此，所以他说“近仁”。因此我们如更具体一点说，他的“仁道”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。

他要人们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机，而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牺牲精神。视听言动都要合乎礼。（就是“复礼”，复者返也。）礼是什么？是一个时代里所由以维持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，这是每个人应该遵守的东西。各个人要在这些规范之下，不放纵自己去侵犯众人，更进宁是牺牲自己以增进众人的幸福。要这样社会才能够保持安宁而且进展。要想自己站得稳吧，也要让大家站得稳；要想自己成功吧，也要让大家成功。这是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，要想办到这样的确不大容易，所以说“为之难”。他也这样叹息过：“我还没有看见过从心坎里喜欢仁的人，也没有看见过从心坎里恨不仁的人。……只要有人能够有一天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仁的身上，我还不相信有什么力量不够的事情。从心坎里欢喜仁的人，从心坎里恨不仁的人或许有的吧，但我还没有看见过。”这也许是他有所愤激的时候说的话吧；因为在他的门徒们里面有一位颜渊，便是“其心三月不违仁”的人。三个月不改变仁者的心肠或许还短了一点，“其他的人便只是偶而仁一下而已。”孔子的理想，是要：“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尽管是怎样的流离困苦，变起仓卒，都不应该有一顿饭的时刻离开了为大众献身的心。这是要自己去求的，自己去做的，并不是高喊人道主义而希望别人给我些什么恩惠。这也并不在远处，就在自己的身边，也就在自己的身上。

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！

仁远乎哉！我欲仁，斯仁至矣！

伯夷、叔齐……求仁而得仁。

仁既是牺牲自己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，这应该是所谓至善，所以说“苟志于仁矣，无恶也”，——只要你存心牺牲自己以维护大众，那就干什么事情都是好的。你既存心牺牲自己，不惜“杀身成仁”，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又还有什么不能够敢作敢为的呢？在这些场合就是先生在前也不能和他推让，他不做，我也要去做。所以他说：“仁者不忧”，“仁者必有勇”，“当仁不让于师”。

但是仁是有等次的，说得太难了，谁也不肯做，故教人以“能近取譬”。或者教人去和仁人一道慢慢地濡染，这就叫作“亲仁”，也就是所谓“里仁为美”。人对于自己的父母谁都会爱的，对于自己的儿女也谁都会爱的。但这不够，不能就说是仁，还得逐渐推广起来，要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。假使推广到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”，你是确实有东西给民众而把他们救了，那可以说是仁的极致，他便称之为“圣”了。他认为尧、舜便是比较接近于这种理想的人格。

孔子曾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，但他自己不曾说出这所谓“一”究竟是什么。曾子给他解释为“忠恕”，是不是孔子的原意无从判定。但照比较可信的孔子的一些言论看来，这所谓“一”应该就是仁了。不过如把“忠恕”作为仁的内涵来看，也是可以说得过去的。这两个字和“恭宽信敏惠”也没有什么抵触。恭与信就是忠，是克己复礼的事。宽与惠就是恕，是推己及人的事。敏是有勇不让，行之无倦的事。

这种由内及外，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，应该就是孔